

三合一選舉後的新黨動向預測

■彭懷恩／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新黨政策會執行長

新黨的族群性與國家認同，使其發展受到結構性的制約，但族群分配與兩岸發展，卻可提供選民另類選擇，因此，短期內新黨尚不可能成為泡沫。

在全球民主化的第三波浪潮中，台灣政治轉型所呈現出的，有其特殊的面向，最大特徵就是原有的威權政權透過類似「木馬屠城式」的內部革命，解構而重構，因此，表面上台灣依然是國民黨執政，但這國民黨的本質已從「中國」淡出，而披上了「台灣」的外衣，這即是李登輝總統所自豪的「寧靜革命」。但這革命的副產品——新黨，究竟是對革命的反動？或是新社會結構中的族群代言人？抑或兩者皆有？在歷經了五年選舉的考驗，答案似乎很明確。新黨雖然標榜「小市民代言人」，企圖以階級性來替換其族群性，但選民的認同上仍將其定位為「中國」，在統獨光譜上的「統派」，族群歸屬上的「外省」，這種先天特質 (ascribed traits)，使新黨既不可能泡沫化，卻也很難進一步發展。

運動能量開高走低

就如許多社會組織的形成過程，新黨也是由社會運動蛻變產生，在運動初期是匯聚了「反台獨」、「反黑金」、以及不言可喻的外省族群「利益代言人」的選票，其運動能量的最高點是表現在民國85年(1996年)總統大選時，即取得約15%的國民大會代表議席。其後即因內部的紛擾，再加上對外擴展的阻礙，選票急遽下滑，到民國87年底的三合一選舉降到約7%。一般判斷到民國89年的總統大選有可能進一步探底，除非新黨領導階層有令社會耳目一新的變革。

三合一選舉結果，對於新黨負責操盤的競選總經理趙少康是沉重的打擊，同樣的，黨召集人陳癸淼與秘書長郁慕明因落選而失去政治舞台，至於落選卻獲清譽的王建煊因無黨內職位也無發動改革的著力點，使新黨內部一時出現權力真空現象。碩果僅存的實力人物，在創黨人士上只剩李慶華，第二代菁英以郝龍斌為代表，但由於新國會議員尚未就職，在以內造政黨

為規範的黨章下，新舊無法交替的窘態畢露。惟因黨內菁英多體認存亡危急的殘酷事實，所以不致於再出現分裂的內鬥。

展望新黨的未來可能演變，大環境的因素與黨領導階層的策略皆具決定性的影響。進一步分析如后。

兩岸關係左右新黨發展

在大環境因素方面，最重要的是兩岸關係的動態變化。由於中共政權對台的壓力政治，使絕大多數的台灣民眾反感，這種心理取向使台灣統獨比例出現變化，對於新黨主張的「反台獨」，也產生了負面效果。這種不利於新黨的政治氣氛，使新黨要爭取台灣民眾支持的努力，事倍功半。雖然，新黨領導階層自我期許政黨立場是符合台灣民眾之生存利益與未來發展，但相對政黨所賦予之「中共同路人、代言人」的政治符號，卻是新黨在選戰中無法擺脫的夢魘。

如今新黨所面臨的意識型態困境是，倘若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則被視之以基本教義派；倘若修正立場，又無法從國民黨處爭取到選票，且會導致黨內同志的批判。在去（1998）年3月出現的「一中兩國」的爭論，實則反映觀念論與務實論兩種立場的矛盾，這矛盾迄今仍未有效解決。

雖然新黨內部多次思考擺脫統獨、國家認同等高層次政治議題，企圖以「小市民代言人」的公共政策路線來爭取選票，但在三合一選舉中，趙少康嚐試批判國民黨營事業與股市的「勾結」，卻引發非所預及的「股災」，影響到眾多「散戶」利

益，這些散戶正是「小市民」身分，其結果對新黨選票的開拓是弊大於利，基此，新黨顯然很難從經濟議題、民生政策上，擴大群眾的基礎。

在三合一選後不久，國民黨副主席連戰對於憲政改革方向提出了「單一選區兩票制」的構想做為未來選舉制度變革的建議，倘若這制度落實，則對新黨的發展將造成進一步的壓縮。因為單一選舉區本來就是有利於兩大黨，而不利於小黨。而兩票制中的日本制又對大黨有過度代表的作用。這些可能的制度調整，將使新黨面臨更大困境。

爭取城市中產階級認同

面對環境制約，新黨中生代的領導菁英已經開始研究「脫困」的策略。在短期的考量仍是以議會路線為主，即在議場上扮演稱職的代議士為務實做法。至於擴大群眾基礎的發展，仍視西元2000年總統大選時的國大代表選舉的總體戰略而定。由於黨的經費及人力資源有限，多數黨公職菁英都主張近期的發展重心放在都會地區，以城市中產階級為爭取認同的重心。這也多少反映選舉挫敗後，黨內務實路線抬頭。

總之，新黨的族群性與國家認同的明確，使其發展受到結構性的制約，但基於台灣社會的族群分配與兩岸發展的可能性，使新黨在選票市場上，可提供選民另類選擇方案，因此新黨泡沫化的預言，短期內是不會出現的。◎